目　录

回忆西路军余部二六八团（即新疆新兵营）的
一段经历……喻新华（1）
赵丹的新疆之行……王为一（12）

杨增新轶事……张其英遗稿（22）
关于我祖父李根源于一九三八年来新疆的经过
……李成缙（30）
关于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及其它
……何语竹　康炳麟（38）
马仲英第二次入疆及孚远保卫战概述……张晏鹏（16）
我参加的几次战役实况概要……金国珍（53）
盛世才时期的新疆省政治干部人员训练班简介
……陈方伯（69）

抗战期间两次去新疆纪略……孙越崎（75）

关于《天山南北》……李帆群（90）
新疆的电讯简史……郑鸿荻（99）
清末以后新疆的佛教……金国珍（103）
新疆近代的寺庙、会馆、义园……刘德贺（11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解放前的新疆航空史略……徐寿桐(123)
我所知道的尧乐博斯……徐　智(132)
酒泉起义的前前后后……彭铭鼎(138)

·资料·

新疆剧台对联二则……王子纯(144)
金树仁统治新疆时期职官表……(145)

回忆西路军余部二六八团（即新疆新兵营）的一段经历

喻新华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旬，艰苦转战于河西走廊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在张国焘“打通国际路线”的错误路线驱使下，经过和马家部队的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最后失败了。三十军八十八师所属二六八团，因当时担任警戒任务，没有参战，成了西路军唯一幸存的一个建制团。这就是后来进驻新疆迪化市新兵营的四百多名指战员。我原任西路军三十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因失败，没有部队，政委李先念同志指示我担任二六八团政治处主任（该团团长杨秀坤、政委姚运良、参谋长饶子建），后任总队（新兵营）政委。因此，对当时的一些情况有所了解，现将知道的一些片断追忆如下：

难忘的安西一仗

西路军失败以后，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由陈昌浩主持，在甘肃的石窝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决定：二六八团由

李先念、程世才等同志带领，经祁连山出山到甘肃西部的安西县，执行西路军原定任务：在安西县立脚，等待陈云、滕代远从苏联运来武器，装备部队，建立根据地。

经过四十多天的艰苦行军，部队终于出了祁连山（此情况已有不少同志写过回忆录，故不再详述）。四月下旬进入甘肃安西县境内。为了攻打安西城，头一天派侦察员先进城侦察，断定城内守敌只有一个排的兵力。于是决定第二天连夜攻城。当我团接近城边时，夕阳还未西下。这时，敌部派出一个湖北口音的敌兵送来一封信，大意是：你们现在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前面有大沙漠，后面有重兵追，城内又有重兵把守，还是投降吧！战士们知情后，气得直骂：城内明明只有一个排的守兵，还想骗我们上当。那个敌兵说：原来是一个排，今天才到了一个刘团步兵（团长姓刘）和一个骑兵营。可是，当时大家攻城心切，一气之下，把派来送信的敌兵给枪毙了。

接着就是绑梯子，全团发起攻击。城内守敌真的增加了一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营。攻城战成了真正的攻坚战。我们武器差、兵力少、子弹缺，加上长途行军，体力一时难以恢复。结果，整整激战了一夜，也没攻开安西城。天亮了，只得撤出战斗。城内敌人见我们撤了，就倾巢而出，包围过来。又整整苦战了一整天，到了黄昏，才突出重围，连夜向新疆方向撤退。跑了一夜带大半天，来到了离安西城一百多里的白墩子。本来想休息一下搞点水喝就走，可是四月的天气是好睡的时候，同志们经过近两天两夜的苦战，又饥又渴，十分疲劳，刚一坐下来，就都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已经半下午了。恐敌追击，我们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可是已经

晚了。安西城守敌的骑兵营已分左中右三路向我们包抄过来了，一下把我们压到了红柳园南部的沙漠地带。敌一骑兵营，我们一个团。他们利用马上的优势连续发起攻击，我们利用沙丘自卫。由于在白天，我们跑不过骑兵，因此不能突围，两军又对持起来。

接近黄昏，安西城的敌步兵团也赶到了。他们先用迫击炮向我们轰击，伤了我军十几人。接近天黑，敌步兵骑兵同时向我们发起攻击。我们坚持到天完全黑了，才组织部队突围。李先念同志及其他军首长带头冲在前面打开缺口，我断后。黑暗中，步骑交叉，敌我混战，部队给冲散了。我突出重围后，在周围找到了八个冲散的同志。我们一行九人，不敢走大路，只能沿着通往新疆的电线杆子的方向，抄小路，忍饥挨饿地往前赶，按部队事先的安排，往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前进。

一路上，我们先到大泉，遇见了结集在那里的我团近百名指战员。从攻打安西到进大泉，三天三夜，我们只吃过一小把干炒的小米，到了大泉才吃了一顿面疙瘩，艰难程度，可想而知。后来，我们这百把人到了马连井，遇见了先到达星星峡的饶子建同志派来找我们的同志，我们急忙向他了解星星峡情况，他说："星星峡情况很好。友军（盛世才部队）对我们也客气，敌人也不敢去搜索"。至此，我们紧张的心终于放下了。记得我当时摘了一点草，往地下一铺，大衣一盖，手枪当枕头，整整睡了二十四小时才醒。

我醒来后，带着部队往星星峡方向走。刚刚离开马连井，从星星峡方向开来一辆大卡车接我们来了。

到了星星峡后，我又连续两次带车回到白墩子、安西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带战场找失散的同志。当我第二次带车回到星星峡时，李先念政委等同志也回来了。这时部队集中到四百多人。

四月底，陈云、滕代远同志带了近四十辆汽车，还有医生、苏联顾问、武器、服装来到了星星峡。见我们吃粮有困难，陈云同志亲自给新疆督办打电话，派飞机运来干粮。我们以前不认识陈云。有一天晚上，他将我们带到了一个远离盛世才部队的地方，对我们说："我叫陈云，是中央代表。""由于路线错误，西路军失败了，但我们延安有部队，革命是有发展前途的。"当时他讲路线错误，我们还不太理解。远离盛世才部队给我们讲话，是为了保密。

在星星峡我们住了一个星期左右。五月三日，部队全部换了新服装，分乘近四十辆汽车离开了星星峡，于五月八日到达了新疆迪化市。

不久，组成了有四个队的总队部，对外叫新兵营（后来增加了一个航空训练队，由新兵营抽调的一些骨干和从延安来的部分青年学生组成）。开始我任总队支部书记，一九三八年秋，我任总队（新兵营）政委。

新疆驻训的一些简况

在新疆成立总队（新兵营）后，组织上对我们的生活安排得很好。专门派小李（名叫冯炫，回延安后任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和老太爷（因年龄太得名，名字不详）招待我们。饮食十分丰盛，几乎天天象会餐。一段时间后，我们这些历尽艰险的同志十分过意不去，不得不建议减少一些菜，生活艰苦一些好。

原来，我们这四百多人打算去苏联学习。后来，共产国际来了一个电报，说人太多了，恐怕影响到国际关系，不能去，叫我们在新疆学习。

任中央代表的陈云同志（化名史平）对我们的教育方法很好、很灵活。一开始不谈张国焘的错误路线，讲一些通俗易懂的道理。也不轻易集中上大课，而是多采用拉家常的方式，今天到这个队，明天到那个队，分头给同志们讲讲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等等。

在新疆进行过两次反“国焘路线”的教育。

第一次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间。支队开了一个反“国焘路线”的大会。当时，大部分同志思想不通，只承认军事路线错了，不承认政治路线错了。因此，没解决多大问题。

一九三八年初，陈云、滕代远、李先念等负责同志回延安。中央派邓发同志（化名方林）接替工作。同年初夏，组织了第二次反“国焘路线”的教育。一开始还有些人想不通，通过深入的教育，方才恍然大悟。许多同志说：以前象喝醉酒，糊里糊涂，现在醒了，是错了。想到部队的惨败，许多战友牺牲，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丢失，同志们如梦方醒，有些同志痛哭了一场。当时，我记得只有个别同志还不承认错。

由于国内外矛盾的发展，当时的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曾一度表示愿意与我党合作抗日。但他一开始对新兵营有些戒备。每次前来，总要带一个卫队团，在四周布置好了后才敢进入我们的驻地。后来，一个什么厅长要搞暴动，准备暗杀盛世才。这时正好我们新兵营进驻新疆，这个厅长也就不敢贸然下手。结果案破，盛世才知道这一情况后，对我们新兵

营的态度有了改变。每星期必要来一次，来时就只带一个卫士了。

盛世才还参加我们的一些纪念会。如“七一”、“八一”、“五一”。“七一”他不讲话，坐在一旁听。“八一”他有时也讲讲话。他当时亲苏，不讲三民主义，不讲共产主义。他有六大政策：反帝、亲苏、民平、和平、清廉、建设。开始他不依靠蒋介石，什么都依靠苏联。后来他拥蒋，杀害了我们不少革命同志，欠下了人民的血债。

本来新疆情况是好的。我们新兵营在那里影响很大，军民之间相处和睦。比如说买东西，只要你说是新兵营的，就不管你身上有没有钱，只要你说声什么时候送钱来，你就可以先拿走东西。当然我们部队是遵守群众纪律的，和盛世才部队相处也较好。一开始为了保密，我们称为新兵营。后来，他们也慢慢了解到我们是红军，是共产党的部队。晚饭后，有时在一起做游戏，有时在一起打篮球，平时还经常在一起搞军事演习。如果当时能在对方部队中发展一些党团员那就好了，可是，我们没有做这方面的工作。

一九三九年九月间，驻新疆的中央代表换了陈潭秋同志（化名徐杰）。第二年初，我们准备撤出新疆回延安，因为盛世才已和蒋介石勾搭上了。国共摩擦时有发生。盛世才借口蒋介石要在新疆办学校，要我们离开新疆。陈潭秋同志考虑到统战关系，就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安排我们回延安，当时我已任总队政委（队长曾玉良、副政委邹开顺），中央电令我和曾、邹两同志一起负责带队回延安。撤离新疆的实际上只有四个队，其中航空队训练没有结束，继续留训。结果后来全被盛世才逮捕入狱。

回延安的艰难历程

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一日，我们四百余人分乘三十多辆卡车从迪化市出发回延安。当时同行的还有三十多辆苏联的汽车，他们是运送武器到兰州援助国民党的，每辆汽车上的篷布盖得严严实实，不让任何人接近。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是错误的，他援助蒋介石却不援助共产党。当时我们四百人只有三十条步枪，外加盛世才送给朱总司令的三挺转盘轻机枪。一路上六十多辆汽车同行，很有些气派。

令人难以忘怀的是陈潭秋代表，他随车队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了二百多里路，不能再送了，才停下来向全体同志话别。他边讲边流眼泪，说“同志们，我们要离别了，以后好久才能见面也不知道。你们回延安后，要好好地听毛主席的话，按照中央指示办事……。”他高度赞扬了我们在新疆的学习精神。说着说着，他喉咙哽咽了。同志们见此情景，想起了在和陈代表相处的日子里，他待人和气，作风民主，遇事爱和同志们商量，阶级感情很深。三十几辆车上的同志都掉泪了，不少同志痛哭失声。

谁知道此次分离竟是永别。一九四三年九月，陈潭秋同志被盛世才杀害了。

回延安的一路上，国民党马家部队处处刁难，层层阻拦，经常挑起事端，妄图消灭我们。

一天，我们来到了甘肃永昌县城。车队刚一进城，驻防的马家部队一个骑兵营列队欢迎。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西路军余部人马，还以为是归国华侨。我们没下车时，他们高呼口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号："欢迎华侨回国抗战！"当我们一下车，他们马上如临大敌。部分部队撤到城外布防，同时关闭城门。在我们休息的地方放上岗哨，个个荷枪实弹。见此情景，我上街转了一圈，只见马家部队全在擦枪，见我走过，有的拉着枪栓，扬言要打死我。我还看到他们兵营里有不少四方面军的被俘女兵，双方认识，但不敢吱声。

为了解围，我找到了苏联车队的领队，说明了情况，他对我说："一有情况，只要你们坚持五分钟，我们就把他们赶出去。"苏联车队也见苗头不对，一下车，每个驾驶员提挺机枪全上了城墙。

后来，苏联车队的领队找到马家部队的头头，骂了他一顿："你们为什么这样搞？他们的营地要你们放哨干什么？"马家部队头头理屈词穷，只得连声说："是，是。我们是为了保护他们的，保护他们的。"我气愤地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不要你们保护，请把岗哨撤掉。"就这样，我们在那里吃了一顿饭，马家部队把城门打开，我们才离开了永昌县城。

一天，我们到了陕西中部地区某县城，太阳还有丈把高。我们三十多辆车刚停在一块平地上，周围是山，前面一条大河。马鹿的部队就抢占了有利地形，在周围山上架起了机枪，不让我们走动。苏联车队一到兰州就和我们分手了。这时，随同我们的一个国民党丁参议前去和对方交涉，到半夜，这个丁参议也没回来。后来，我们又派了一个自己人去交涉，同时也做好了战斗准备。我们只有三十多条枪、三挺轻机枪，要交起火来是相当危险的，但也绝不能束手就擒。后半夜，这个参议才回来，对我说："政委，危险哪。他们准备把我们

打掉。”我说：“我们知道，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不先开枪，他们开枪，我们就要打一下子，不会让他们占便宜的。”

马鹿为什么要打我们呢？据这个国民党参议说：附近的鄜县（现在的富县）国民党部队和八路军闹磨擦，结果被八路军缴了枪。马鹿也派了两个专员在这个县工作，被我八路军同时扣留。因此，马鹿想借此为理由，在我们身上报复。最后，一直交涉到后半夜，直到这个国民党了参议答应负责和八路军协商，把两个马鹿的专员放出来，才让我们离开这个地区。

部队连夜出发，天亮时，到达了洛川县城。

回延安的一路上，每过一地，总要受到马家部队的无理刁难，其中有四次是相当危险的。有的问我们带枪、带子弹干什么？我们回答是防土匪，他们才没话讲。有的以搜查为名义，侮辱我们的女同志，引起我们的愤怒，才不敢下手。真是层层拦阻，处处险关。

一九四〇年二月初的一天傍晚，我们终于回到了日夜向往的延安，回到了毛主席的身边，回到了党中央的怀抱。

在延安的幸福日子里

看来延安早就有准备。当我们一进入延安，道路两旁兴高采烈的军民夹道欢迎，又是呼口号，又是放鞭炮，热烈的气氛真是难以形容。无形中，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当时作为领队的我，光顾了高兴、激动，向两旁的人群挥手致谢，却没有仔细地看一看这令人难以忘怀的场面。

接着，在一个竹子搭起的简易礼堂里开了欢迎会，台上

台下灯火通明，红绿标语贴满四周。毛主席、陈云、滕代远、邓发等首长全坐在主席台上。是谁主持会议我已记不清了。我记得，首先由我代表四百名西路军指战员讲话。我说："同志们，我们现在到了延安了，回到了党中央怀抱来了，回到了毛主席身边来了，多么幸福啊！我们今后要听毛主席的话，执行中央的指示，服从领导。我们以前错干了十年，失败了。今后要跟毛主席好好干革命……"。

我大概讲了近半个小时的话，中心话题是：跟张国焘错干了十年，感到惭愧。接着，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他首先给予我们高度评价："你们没有错干，你们干得对。你们是革命的宝贵财富，是千两黄金买不到的。"对于我们这些深受张国焘之害的战士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鼓舞人心呢！听到这里，我们的双眼含满泪花，会场里掌声经久不息。毛主席又说："过去的事不要你们负责，应该由张国焘负责，是他错了，你们没有错干。你们今后要接受经验教训，好好干。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毛主席大概也讲了半个小时左右的话，因时隔四十年了，详细的已记不起来。

在延安毛主席、朱总司令分别代表党中央、中央领导同志、中央直属机关设宴招待了我们。为了让我们生活得好，在延安个把月时间里，我们天天吃白面，没吃过杂面。而中央领导和直属机关都吃杂面、小米。

以后，每天上午，由一名中央首长分工，给我们上课。讲统一战线，讲政治、军事形势，进行政治教育。下午组织我们参观延安。还安排我们看了话剧《红日》等。

同年三月初，组织上分配我和饶子建同志带一百多人到

新四军五师工作，由我当指导员，饶子建当队长。后来由于途中情况变化，到不了五师，我们就留在彭雪枫四师工作了。新兵营其他三百多人的分配去向我就不清楚了。

（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协助整理）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

赵丹的新疆之行

王为一

赵丹坎坷的一生中，新疆之行可算是他生平的第一次大难。同罹此难的有五人：赵丹、徐韬、朱今明、易烈和我。徐韬已含冤死于“文化大革命”中，易烈被毒死于新疆监狱。现在赵丹又离开人间了。为了悼念这位人民艺术家，我有责任把新疆之行的始末写出来，以增进朋友们和广大读者对赵丹、也同时对大家所熟知的《海魂》和《关汉卿》等名片的导演徐韬的了解。

一九三八年秋，武汉失陷，我来到陪都重庆，同相别大半年的赵丹聚首了。当时他精心导演的话剧《阿Q正传》正在演出，我为中国电影制片厂编导的《为自由和平而战》也演出了。

此后，我和赵丹同台演出了《上海屋檐下》、《一年间》、《全民总动员》等舞台剧。我们有一个共同心愿，就是希望在舞台艺术上做些有益的探索。

当时演出这些戏，都是利用社会团体组织的，以在重庆的名演员同台演出为号召。演出时，我们发现，一台戏，演员们的表演方法很不统一，很不协调。大演员们各有一套吸引观众的表演手法，真有点“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赵丹

和我感触很深，认为演戏除了达到某种思想意义外，还应当在艺术上力求完整统一，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却茫然无所措。正在这时，苏联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体系渐渐通过翻译书籍传播到山城来了。这使我们产生了强烈的向往，希望我们中国也能建立一家象莫斯科艺术剧院似的剧场，从而建立起有中国传统的戏剧表演体系。为此，最好先有机会到莫斯科艺术剧院去观摩学习，当时这只是空想。这种思想也感染了十多年来在舞台艺术上志同道合的舞台设计家朱今明。记得有个晚上，我们在演戏散场后三人走在静寂的马路上漫步回家，一路上我们谈论着美好的理想。虽然没有什么结论，但一个朦胧的信念，开始萌生在我们的心中。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重庆一个全国报纸展览会上，看到一份印刷很差的《新疆日报》，其中有条消息说，迪化（即现在的乌鲁木齐）某女子中学举行班际话剧比赛。这是全国其它大城市未曾有过的盛举。我们想新疆对话剧一定是十分重视。不久又读到一本杜重远著的《盛世才与新新疆》，其中着重写了盛世才在新疆执行“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和平、建设、清廉”的所谓“六大政策”。更为吸引人的，是说新疆有许多苏联专家在帮助建设，每年新疆要派遣许多留学生去苏联学习等。杜重远是办过抗日刊物的著名爱国实业家，他的书我们是深信不疑的。我们象发现新大陆似的高兴，幻想着先到新疆，再请新疆方面派我们去莫斯科艺术剧院学习，待抗战胜利后回上海，就可以筹建中国艺术剧院，建立中国的戏剧表演体系了。

但是怎么去新疆呀？从哪儿去找门路呢？偏巧，报上登载了新疆学院委托重庆生活书店招生的广告，而生活书店一位

编辑史枚又在这时为出版我的剧本找我联系，我就趁机问他生活书店和新疆的关系，得知茅盾、张仲实和杜重远已在新疆工作，生活书店正在计划在新疆成立分店。这些消息更增强了我们去新疆的决心。我们即问韬奋先生（生活书店的负责人）能否介绍我们去新疆？他答应去问问。过两天，史枚来说韬奋同意介绍并约我们面谈。与韬奋见面时，他还鼓励我们去，答应就打电报给茅盾、张仲实和杜重远。数日后接到茅盾等的回电，大意说，此事已告盛公（指盛世才），表示欢迎，但新疆生活很苦，望我们慎重考虑……我们三人认为去新疆并非为了享乐，请韬奋再去电表示我们的决心。茅盾再回电时，就说欢迎我们去，并希望我们多邀些人，和置办些用具去，经济和交通问题可与新疆驻渝办事处接洽。

这样，去新疆事便成了定局，但这件事又不能宣扬，因为盛世才是“反蒋”的，蒋介石对新疆虽然鞭长莫及，但在兰州一带驻有嫡系军队严加防范。因此我们只能悄悄告诉知己朋友，但朋友们知道了多有表示愿和我们同往的，我们表示此去前途未知，若有作为，再邀大家去也不迟，否则，我们也很快就会回来的。但我们三人私下商量，作为建立一个剧院的体制来说，赵丹和我可以抓导演和表演部分，今明抓舞台工作，但缺少一个剧院的组织者，于是想到了徐韬，他是这方面的理想人才，又是我们十多年的老伙伴。徐韬此时在广东曲江，是演剧一队的队长，我们立刻去信告诉他，如同意即来重庆。另外，想到应该有个专搞舞台音乐和音响效果的人，赵丹介绍了上海音乐院出来的青年演员易烈。不久，徐韬来渝，欣然表示愿意同往。就这样，除了易烈，我们四人都带上了妻子，外带赵丹的一岁的儿子，抱着梦一般的幻

想，搭上长途汽车向兰州进发，时为一九三九年六月。

到了兰州，妇女孩子搭乘运输机去新疆，我们男人转乘卡车带着行李和一些舞台用具西出嘉峪关，过星星峡入新疆，经哈密到迪化。我们被安排住在南关的招待所。先行到达的妻子们一见面就向我们透露：茅盾夫妇来看望过她们，要她们注意说话和行动。我们还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茅盾来看我们了，就悄悄对我们说，新疆的政治情况比较复杂，错奋来电报时，我们三人（指茅、张、杜）商量还是不让你们来为好，但是不能直说，我们就对盛说，赵丹他们都是大明星、大演员，生活优裕，来新疆怕吃不了苦。盛同意按这意思复电。我们回电是想暗示你们不要来，谁知你们没有理解，只好让你们来了。来了就不能随便走了，想法订个两年计划，替新疆做些工作，等你们计划完成，再提出回去。

听了茅盾这一席话，我们全身都凉了，来新疆前的一切美好的理想象泡沫一样的破灭了。新疆的政治情况究竟如何复杂，这两年将怎么度过，我们完全茫然了。后来我们听说当周恩来同志得到我们离开重庆的消息时，曾派冯乃超同志阻止我们去新疆。可惜晚了，那时我们已经过了星星峡。

盛世才请我们几个男的吃了一餐饭，茅盾、张仲实、杜重远三位作陪。盛世才身材不高，但很壮实。面色铁青，眼有杀气；一对浓眉三角眼，两片嘴唇厚而黑。看样子就是个厉害的家伙。事前茅盾已提醒我们，所以席间我们都没有说什么话，盛只是随便问了下我们的情况，并嘱咐茅盾解决我们的工作问题。

我们计划成立一个实验剧团，吸收一批学员，两年后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